

朱绍侯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李振宏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朱绍侯先生近照

寿山福海

恭賀朱紹侯先生

九十華誕

字在山米黃今言



陈国桢先生七十寿诞

史

造

泰

年

吉

增

寿

福

一点良辰
陈国桢
不肖





李旺枝先生书杨傑贺寿中堂

文泉如流水出峽

朱紹虞先生九十華誕

心鏡似皓月當空

歲在乙未之夏月
李旺枝書



史學月刊用箋

明先生：

檢閱拙稿“关于秦末斗争与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所提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提了一些意见供你参考。所以预先和你商量一下，因你亦不想因为这个为问题再争论下去。

你原意见即篇短文的用意，在于说明秦统治者不额外选而调边军镇压国内人民，同时也说明为什么秦时迅速发动反攻，但由于疏忽了史记王翦传有关王离的记载，而犯了错误。根据你现在的意见，可以看见秦末当农民正在起义时，秦帝国是从两方面发起了反攻，即从关中从上郡开始反攻，这两路秦军起了配合作用。目前史学界所发表的关于秦末政府军镇压农民军的经过还没有这种提法，特别没有人提到秦军即用边防军镇压起义，我想你改善时如果在这方面多举一些实例是必要的。

所提是否正确尚祈指正！

此致

敬礼

朱绍侯 1977.27.

年 月 日

熊基同志：

来信敬悉。在此之前，也接到一封林剑为同志的来信，十分感谢您的二位的美意。“修网之路”考察，是我早已向往而又不能实现的愿望，遗憾的是现在机会少了，我又不得不放弃。原因有二：一、今年我参加的会议太多，从今年四月中旬到十月，我几乎月月有会；二、我靠学术活动经费仅三千元。不考“修网之路”，我也要用去十分之一。若考，就要用去近三分之一。我是教师干部共九十九人，我一个人占去这么大的比例，实难开人，而特殊的掌握这笔经费的负责人，这就更难办。基于上述情况，我只好争取下一次的机会有。

高敏同志已去过“修网之路”，顺告。

敬礼

张庚

1982.5.2.

序

时间真快，倏忽之间又是十年过去。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庆典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又迎来了先生的九十岁诞辰。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作为先生的弟子，十年间，我们差不多就是以这样的心情，陪伴着先生走过来的。不过，我们心中的欣喜比之孔子所言更为充实，不仅是为先生的寿考而喜，还惊喜于先生年近鲐背仍能焕发不逊于年轻人的创造力！

先生学术生命力之旺盛，在高年学者中可谓少见的例证。

这次举办先生九十华诞盛典出版的《朱绍侯文集（续集）》，洋洋六十万言，全是先生这十年的新作。十年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平均每年有四五篇新作发表。

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先生40万字的大著《军功爵制考论》。军功爵制研究倾注了先生毕生之心血，此前有《军功爵制试探》《军功爵制研究》出版，《考论》是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简牍材料出土之后，在前作基础上新的探索。

也是在这十年中，由先生主编、多次修改定稿的六百万字巨著《今注本二十四史·宋书》，最后定稿杀青，即将在巴蜀书社出版面世。先生因此而在中华文化促进会 and 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2012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典礼上，被授予“中华文化人物”称号。颁奖典礼会上的评语是：“鉴于朱绍侯先生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期间所表现出的令人敬佩的学术精神与史学贡献，经中华文化促进会

主席团会议通过，授予‘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

2015年第5期《史学月刊》刊发先生的新作《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宏文七万余言，从战略高度鸟瞰两汉几百年间的重大民族战争问题。此论题之宏大，视野之宽阔，思维之缜密，论证之谨严，很难使人相信它竟是九十岁老人的手笔！

作为先生的弟子，除了学问方面，从先生身上感悟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先生宽仁忠厚的仁者品格。《论语·雍也篇》，子曰“智者乐，仁者寿”；《礼记·中庸篇》，子曰大德者“必得其寿”。其实，先生就是一个仁者寿的例证。宽仁忠厚，是学界对先生为人的基本评价，先生的许多学术成就也是与此相联系的。

先生主编过许多大书，像享誉学界的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是几十年来历史学界公认最成功的高校文科教材。该书出版三十多年来，历经五版数十次印刷，发行百余万册，覆盖了全国高校百分之六七十的历史学专业。而其主持编写的过程，就最好地体现了朱先生宽仁忠厚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组织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时，先生既不年长，也还只有讲师职称，但十个院校的学者们则一致推举他做这个并不轻松的主编。集体编书，把众人的智慧凝聚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参加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学术思想不统一，学术风格各异，要将其变成一个齐心而和谐的团队谈何容易！先生则凭着虚怀若谷的品格，平等待人的作风，以及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学术操守，使得他的组织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成功地完成了教材的编写任务，而且通过教材编写，还造就了一个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团结合作的学术群体。十院校合作单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的钱宗范先生评价说：这部教材历经几十年长盛不衰，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多院校合编教材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朱绍侯先生作为十院校公认的深孚众望的主编，他不仅以自己的品德和学术，影响和教育了他人；而且他一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尊重他人，谦虚谨慎，发扬每一位撰稿者的长处，调解编写中的不同矛盾和意见，做出正确的公正的决断，因而取得大家一致的拥护。朱绍侯先生对十院校合编《中国

古代史》教材所取得的成功，对十院校友谊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钱宗范：《我所认识的朱绍侯先生》，《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宽仁忠厚的品格，也贯穿在他六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对待学生，甚至是年轻他几辈的陌生后学，他都倾力相教，热心解惑。他不知给多少人批改过著作文稿，无论他多忙多累，对于学术求助，从不拒绝。有些功力差的年轻人的作品请他指导，他能不厌其烦地在其文稿上划出上百处错误，其耐心，其热诚，使后学汗颜并为之动容。对后学的热心相教，平等、谦和，他教过的所有学生，或者是曾经向其请教过的人，无不留下深刻印象。曾经有毕业生赋诗留念：“润物无声，谢良师，难忘校园多雨露；凌云有志，勉学子，莫愁前路少人梯。”

先生体型富态，没有过多的锻炼项目，其长寿的秘诀是心宽和思考。任何事都不和人计较，甚至以德报怨；不停地思考问题，倾心于学术写作。去年学校让总结先生的做人之道，我写了一篇小文，命题为“视学术如生命，用生命做学术”，先生大半生的经历，就是与书相伴，不停笔耕。在八十岁以后，很多人从健康着想劝他不要再这样苦苦于写作了，要静下来养生，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学术信念支撑着他的健康。脑子只要在用，就不容易糊涂，只要有追求，有事做，就不会空虚，就可以延缓衰老。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的养生之道，就是“学术养生”。学术是他的生命，只要还有新的学术课题需要思考，需要探讨，他就可以不老。这是先生的信念，也是他的人生！

就在这样不停地思考和写作中，先生又迎来了他的九十华诞。和八十岁生日一样，先生工作过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出版社、史学月刊编辑部几家单位都积极张罗给先生做九十岁生日庆典，我们几个先生的弟子更是心存感激，并竭尽心力。三家就庆典事宜协商分工，分头筹备，我和龚留柱兄领命编纂两本祝寿文集。留柱兄负责搜罗、编辑先生八十岁之后这十年发表的作品，集为《朱绍侯文集（续集）》一书；我则负责向学界同仁征集纪念文集的大作。不过我所负责的这本文集的命名则颇费思索：是从朱先生的角度来命题，还

是从文集作者的恭贺之意来命名，还真是不好定夺。最后，只好就事论事，白话直说，命题为《朱绍侯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取了个既省事又直白的书名。

文集“约稿函”一经发出，便得到了学界友人的广泛支持。高年者如年届鲐背的朱寰、赵德贵先生，安作璋先生，张传玺先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刘泽华先生、熊铁基先生、仓修良先生、王云度先生、宋应离先生等等，诸多前辈都纷纷赐稿，使文集的征稿、编纂工作极其顺利。截至六月底，收到赐作六十余篇，近七十万字，是谓学界送给先生寿典的一份丰厚大礼！

文集的编排，分为几个板块：一，理论性论文，按论文关照的宏观性排序；二，实证性研究，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先后排序；三，先生友人或弟子回忆性的文章，按作者的年齿排序；四，关于先生学术的评论，以发表时间先后排序；五，诗词楹联。

文集并非学术专著，因此编者并没有下工夫对全书做统一文风的处理，除个别非历史学出身的作者，没有严格按学术规范处理引文注释外，所有学术性文章，编者做了统一注释规范的工作。两位青年朋友刁华夏、苏小利帮助核对了部分引文。

在文集正式出版之际，我们对学界友人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对河南大学出版社为两本文集出版的慷慨赞助表达深深的敬意，并和广大作者同仁一道向我们所景仰和爱戴的朱绍侯先生，表达最美好的生日祝愿！

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李振宏

2015年9月21日

复兴儒学是文明的提升吗

刘泽华

近年来，“国学热”“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高歌颂扬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也开始曲下双膝，顶礼膜拜。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说国学、儒学的有如彩云（因说得天花乱坠）遮日之势，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又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这些人常常拉大旗、接话头——某某领导人说“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弘扬优秀文化”，接下来就说是“国学”，尤其“儒学”就是这个“灵魂”。概念互换，鱼龙混杂。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不仅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需儒家化，这能行吗？下边只说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国学、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有否不同阶段(或形态)? 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诸子都有相关的说法，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以及“大同”“小康”之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的。其实我们翻翻域外的史学著作，凡是论述人类史的，几乎都有这样与那样的“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区分之中，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那时我们以特定的阶级关系作为区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说到思想，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虽然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有某种程度的阶级性，但在80年代初即提出还具有社会性，所以在我当时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无论对哪个思想家都没有带阶级的帽子，但他们的社会利益倾向我绝不回避。从80年代到今天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但就社会形态我并不简单说是“王权社会”，尽管在我看来，中国从进入文明始，就走上王权支配社会之路，但社会还是有不同的形态。文明早期我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替代它，而常用的“封建社会”也不是“封邦建国”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我多次在文章中表达，完全可以用某个新的概念进行表述，这些年学者们提出了种种命名，但我还难做出选择。从20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说的就是等级。至今我仍不简单地避开阶级分析，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进行“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

社会有形态之别，意识也必定有形态之别。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无疑有互动作用，某些思想观念对社会存在会有某种超越成分，但它的主体必然是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考察和认识，它的超越也必然是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起点，无法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纠葛脱钩。孔子及其后的儒学从汉武帝始是帝王认定的意识形态，对此不应该有异议吧？除了它自身传播外，应该说更主要的是由帝王选用各种手段使其实现社会化，对此也不应该有异议吧？儒生大量涌入仕途，依附于王权，升官发财，成为官僚地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也不应有异议吧？儒学确实有关怀、同情民众的一面，但从大局说，暂且抛开简单的阶级定性，儒家主流所论所为，对谁更有利，难道不是更有利于帝王体制吗？有些学者试图用“文明”“文化”“价值”独立把孔子、儒家与帝王制度分割开来，可能吗？“文明”“文化”“价值”难道没有阶级性？难道没有利益倾向和对那些人更有利的问题？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不能环顾左右而言他。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

儒家思想是封建帝王的工具

有些尊儒高调真是难于理解，这里只引三句：

“没有孔子，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而讲的。”

面对这类高调，真不知如何评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的，1949年后才逐渐确认有56个民族，难道都是孔子哺育的？都是孔子的私生子？把中华民族当成挂在孔子脖子上的项链行吗？我们

不必假设“没有孔子”会如何，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极为复杂历史因素和过程的综合，怎么能把历史简化到这个地步？孔子之前就没有华夏共同体？孔子之后又有多少人不信孔子之学，难道他们都排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外？

说到“导师”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是多元的，至今依然如此，说孔子是尊孔人的导师当无疑问，怎么能加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一

儒家文明是为“人之为人”而设计的，那么多不认同儒家文明的人是否就应开除“人”籍？这种说法已经超出儒家文明的传播，而堕入强行“扩张”和“侵略”之列，令人不寒而栗！“人之为人”有诸多论说，孔子与儒家认为“礼”是根本的标志。只要稍稍关注一下战国诸子，这只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说法。本来孔子的独断性是很强的，这种说法比孔子更甚。真令人惊恐！

诸如此类的说辞几乎都意在把孔子、儒学同帝王体制拉开，表示是独立体系。但作为帝王确认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呢？我不否认儒家对帝王体制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性和制约性，而且对在位的帝王常常有很严厉的批评，历朝历代不乏忠谏之臣。像海瑞竟然敢于用“家家皆净”嘲讽嘉靖帝。可也正是他在死牢里听到嘉靖帝驾崩竟然悲痛得泣血。致君尧上与维护君主体制就是我反复论述过的一种“阴阳组合结构”，构筑了忠谏之儒主奴综合人格。在实际上儒者更多是从帝王那里求利禄，也算是一种交易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也告白儒者：“书中自有黄金屋”；反过来，帝王能买无用和反对派？离开帝王体制论儒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还有把儒家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体”、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当然合乎其逻辑，但扩大到中华民族我期期以为不可。作为特定历史

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和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沿，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历史走入现代化，中华民族的社会观念也更加多元化。试问，儒家能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就文化保守主义来说，也不止儒家一说，能是儒家之外的保守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如果局限在尊奉儒家派内当然是自己的选择，但请不要覆盖中华民族！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含义，有多少是从儒学平移过来的？

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是超时代的。作为具有“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如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等等，无疑都可继续沿用，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充实新的内容，俗语说的“旧瓶装新酒”。

“忠”这个概念有复杂的发展过程，大约到战国后期，其主要含义向忠于君主集中，其后两千年，忠主要表达的是一种主仆观念。我们也有过极度的复辟经历，经过反思，还需要倡导吗？

比如“礼”，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有人说是礼貌，说礼貌固无不可，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

我们也大力提倡“孝”，孔子说“无违”是孝的最高境界，孝的规范首先是“顺”，父辞世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现在这些还适用吗？

说到孔子的“人之为人”，我认为请不要忽视，孔子和儒家倡导的是“等级人学”，而不是人人平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鲁迅把旧道德说成“吃人”是文学的语言，但人格不平等则是事实。对历史上的等级贵贱的评价可以多样，有人对“三纲”也进行肯定亦无不可，但请把“三纲”的内容说清楚，不能抛开事实。

现在有些舆论惊呼道德失序，道德沦丧，鼓噪往日的道德如何如何美好，儒家的道德可以救世等等。我大不以为然。进入现代化社会